

WENSHI ZHISHI

1987



文史 知识

《诗经》中反映的先秦婚俗

袁 梅

词中的《哀江南赋》

缪 钺

中国古代的祠堂建筑

丁宏伟

扶风法门寺佛骨舍利的来龙去脉

周绍良

中国社会史研究概况

常建华

第三次征求意见致读者

本刊编辑部



医药学院610 2 01472442

文史知识

1987年第11期

(总第77期)

• 治学之道 • 我的治学体会	胡国瑞	3
• 文学史百题 • 老树春深更著花——清词述略(上)	严迪昌	9
• 历史百题 • 清代的家庭结构及其人际关系	冯尔康	14
• 怎样读 • 《诗经》中反映的先秦婚俗	袁 梅	21
诗 情思缠绵 韵味悠长——读《诗经·周南·汉广》	唐佩瑶	28
文 见燕燕归来 兴无穷感慨——刘禹锡《乌衣巷》赏析	陈志明	32
欣 词中的《哀江南赋》		
赏 ——读元好问《木兰花慢》(拥都门冠盖)词	缪 钊	35
• 古代科技史漫话(7) •		
中国古代的气象观测	潘耀昆	37
文化 我国远古的一种婚姻形态	王文锦	42
史 二十四节气	陈 旸	46
知识 中国古代的祠堂建筑	丁宏伟	50
• 中国历代官制讲座(连载四十) •		
清代官制(一)——满汉杂糅的中央官制	王钟翰	53
• 金石丛话 • 八、汉代石刻文	施蛰存	59
人物 “山中宰相”陶弘景	顾伟列	63
春秋 晚明散文家、史学家张岱	何永康	68
绝代才人 薄命君王——南唐后主李煜新传(4)	田居俭	74
• 文史信息 • 两晋妇女风貌(8) 中国人接受佛教的特点(80)		80
古代的人殉和殉节(80) 宋代文化发展的原因(81)		

读书	读《风俗通义》	王利器	82
札记	《牡丹亭》语言琐谈	张燕瑾	84

• 宗教与人生 •

扶风法门寺佛骨舍利	的来龙去脉	周绍良	87
从紫禁城内	欢喜佛谈起	金 申	94

俗语	一瓣心香 昙花一现 聚沙成塔		
佛源	慧眼 横死 磨砖作镜	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97

袁枚的思想哲学和文学观念	胡 明	99
--------------	-----	----

学术流派	心性本净与心性本觉		
评 介	——吕澂先生在佛学研究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张春波	104

• 书画欣赏 •	“章草”絮谈	陈振濂	109
----------	--------	-----	-----

• 青年园地 •	元杂剧《汉宫秋》《梧桐雨》比较谈	贾元苏	111
----------	------------------	-----	-----

• 文史信箱 •	电视剧《红楼梦》与《二十四史》	刘乃和	115
----------	-----------------	-----	-----

• 文史研究动态 •	中国社会史研究概况	常建华	118
------------	-----------	-----	-----

• 读者 • 作者 • 编者 •

第三次征求意见致读者	本刊编辑部	124
张果传说最早见于《明皇杂录》吗？	冯纪友	128

• 补白 8 则 •	囊萤夜读者 (27) 岳云考 (31) 李义琰不置宅舍 (45)
	吕蒙不记人过 (49) 学仕 (73) 孟子论深造 (86) 以
	学自损不如天学 (114) 志 • 动 • 效 (123)

《急就章》	〔明〕宋克(封二)	法门寺佛骨舍利(封三)
-------	-----------	-------------

我的治学体会

胡国瑞



胡国瑞，湖北省当阳县人，1908年生。武汉大学中文系毕业。现任武汉大学中文系教授、校务委员，湖北省文学学会会长，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九三学社湖北省委委员。著作有《魏晋南北朝文学史》及魏晋南北朝文学、唐诗、宋词论文三十多篇。

我是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多年来，主要从事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及唐宋诗词的研究。

我对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较注重于作品本身。因为整部文学史是由许多时代无数作家以其创作所写出，一个时代的文学现象亦由当时许多作家以其具体创作所形成，一个作家的成就，也表现在其平生遗留下来的作品上。所以，无论是对一个作家或一个时代以至相续几个时代文学的研究，都必须立足于作品的研究。文学作品是作家的精神产物，优秀的文学作品，凝结着作家高尚纯美的感情，而以优美灵巧的手段表达出来，产生丰厚的艺术魅力，影响着读者的精神世界。因此，精研作品，深入作家寓藏其中的高尚精神境界，有助于陶冶读者的优美情操，而同时分析探索其艺术表现的魅力所在，亦可作为今天从事文艺创作者提高艺术水平的借鉴。在这基础上开展对作家及时代文学问题的研究，则可精要地把握理解问题的基因。当然，这一切从微观到宏观的研究，还须借助平时蓄积的历史、哲学等方面的知识。

精研作品，应是研究工作的首要工夫，也可说是重要的基本功。对一篇作品反复深入体味，索得作者在其中的深曲情思及其艺术表现的用心所在，便是对研究工作的微分的累积。这样累积的工夫深厚，

则研究问题应用的材料丰富，而由于那些材料都是自己深切理解的，运用来阐说问题便可妥贴、精深，从这些材料中得出的论点才能坚实而不可动摇。同时，因为这种论点是自己独自从材料的实际中得来，所以也才可能新鲜而具有创见，不致于随俗俯仰，人云亦云。

传统的读书方法有“精读”及“略读”二种，“精读”乃对作品或专书作精细的诵读及钻研，从而增强读书能力，进而获得具体的学问知识。“略读”为对作品或专书作泛泛的浏览，获得大致印象，便于扩大知识面，为有时研究某一问题提供搜寻资料的线索。这两种方法现在还是可以采用，但许多青年同志很少能用“精读”方法，因为他们的知识运用周转很快，不愿把时间精力投向基础的填充上来。其实如能作长期打算，有计划地选定一些书，在一定期限内，每天拨出一部分时间，坚持不懈地读下去，行之数年，成效定有可观。这对青年同志是必要的打好坚实基础的方法，采用这种方法，可能眼前效用不显，积以较长岁月之后，其发挥的作用定是巨大的。在这一点上，我体会尤深。我从高中起，逐渐读古典文学专书。高中三年读了《文心雕龙》、先秦诸子和一些文学作品，其中老、庄之作读得较精细，读写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后来，进了武大中文系，成了生活学习上完全自由的人，除了上课，无任何约束。在这四年中，经史子集都有所涉猎，除对《诗经》《楚辞》《周易》《礼记》《左传》《论孟》等都曾细心研读外，当时读书用力较多的在三个方面：一是史书，整个“四史”依次全部读了，前后《汉书》是白文，从正文到注解，全用朱笔点断，对赏爱的章句还加密圈，对《后汉书》的许多传论尤为欣赏，常反复朗读，至能背诵。其次是《文选》。这部书长置案头，随时诵读，其中许多宏篇巨制及精悍短章，都曾能背诵。这番工夫，对我后来写《魏晋南北朝文学史》作用巨大。写这本书前后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因有《文选》的基础，所以当时写来能得心应手。第三方面是唐宋词，因得刘永济师指教，是我当时用力最多的。除了《花间集》及几种选本如《宋四家词选》、《七家词选》、《花间绝妙词选》、《词选》、《宋词三百首》等外，更全读了《四印斋所刻词》及《宋六十名家词》中的许多重要作家的作品。我的兴趣，始则流连欧晏及淮海、易安，继则沉浸于美成、梦窗，

中亦浸润于白石、梅溪、碧山、玉田，惟对东坡、稼轩赏爱始终未衰，当由人生感情气性易相接近之故。我在这方面倾注的心力，极少发挥在研究上，几乎全消融在创作里了。至于诗歌方面，除了两年课中通读了汉魏至唐代的代表作外，为了学习作诗，遵照老师指示，研读了曹植、阮籍、谢灵运、陶渊明、鲍照、谢朓、庾信诸家的作品，我认为这是学诗者在《诗经》、《楚辞》及汉乐府以外必具的文人诗的基础，也是学诗的一条正确途径。这时对于李杜还未及专下工夫，对《玉溪生诗集笺注》却常以朱笔圈圈点点地读着。也以同样方式读《施注苏诗》，数十年来，爱赏未曾间断。除了上述那些基本的阅读之外，也还泛览许多书籍，如《世说新语》是时常赏阅的，再如宋人笔记《老学庵笔记》、《齐东野语》之类，都是文学性较强的。当毕业前写关于宋词的论文时，曾把《词话丛编》粗略地翻阅了一遍。在四年中的前三年，先后在文字、声韵、训诂中钻研了《说文解字段氏注》、《广韵》及《尔雅义疏》，这是必具的“小学”基础，不过因非我兴趣所在，未多下工夫。大学四年，是我奠定学问基础的四年，以后教了十年中学，只能因隙零碎读些书，当然在知识上有所丰富。到回大学工作，便适应工作的需要，而在原基础上从某些方面努力加广加深，终于在科研上发挥出重要作用。

我的科研工作起步于1954年，这距我大学毕业已有十八年。当五十年代初，《光明日报》上的《文学遗产》专栏创刊后，我曾写一篇谈辛弃疾《永遇乐》的文章寄去，未被采用，因为写法不当。我感到，我过去积下的古典文学基础，好似一堆木材存放在阴暗角落里，看着发霉而无法运用。1954年夏，高教部聘请苏联文艺理论专家毕达可夫在北大讲学，我有幸被派去学习。这时苏联的许多文艺理论著作正被大量译过来，如季摩菲耶夫的三本文艺理论教科书，及《马恩列斯论文艺》等，我也如饥似渴地尽量吸取。在课堂上除了听毕达可夫讲文艺学外，还听了萨坡什尼可夫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思想上获得了一点文学和哲学的理论武装。初到北大时，我有机会参加了《文学遗产》编辑部在北大召开的李白讨论会。在讨论中我对“李白诗歌的现实意义”一问题提出己见，认为李白的思想感情应与其所处的历史现实密切相关，这一点是从列宁的《论托尔斯泰》中得到启发的。列宁说

到托尔斯泰的思想矛盾，乃是当时现实的矛盾在托尔斯泰头脑中的反映，我由此想到，对李白诗歌中表现的许多思想感情的矛盾，也应如此去理解。不久放了暑假，我便利用这段时间通读了李白诗集，记下心得要點，接着阅览了《通鑑》的“玄宗紀”及“代宗紀”，记下与李白思想及创作有关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资料，首先写出《论李白诗歌的现实主义》，接着又写出几篇关于李白诗篇其它几个方面问题的文章，每篇都在《文学遗产》的报刊或增刊上发表了，从此走上了科研道路。由此我感到理论的学习对我的科研工作的关键作用，而理论的核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归根是实事求是。在上述理论指导下，充分掌握运用作品及历史的原始材料，不受任何传统的权威性见解的约束，即可建立自己坚实的具有独创性的论点，在学术上作出切实的贡献。我后来的科研工作，大致都是本着这一要旨进行的。如对开国以来被贬抑的魏晋南北朝文学，根据我从实际摸索中得到的认识，充分肯定了它的某些方面的艺术成就，及在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而对这时期作家在艺术上的追求，应看到其中功和过的互相倚伏。对于唐初和唐末的诗歌，并实事求是地阐扬它们的时代意义及某些方面的成就，意在纠正过去的偏见，以期无负于古而有益于今，因为对文学遗产过分的排斥，并无伤于古，而只会影响我们对文化营养的广泛吸收。

总结我上述的治学要点，可极概略地归结为坚实的作品基础和必要的历史、哲学知识的运用及正确的理论指导。而作品基础最为根本。大量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吸引着我反复不已地沉泳于其中，消磨了我大量的时光，我也从中获得丰富的精神享乐，对此我从不惋惜。我惋惜的是有段较长时期未利用这基础有所作为。对作品如此下工夫，使自己较熟悉地掌握从事科研所必需的基本材料，在理解和运用中较少阻力，在艺术上能探得作者的用心，可对作品阐释得细致深刻。也由于过多致力于学作，在长期的涵泳陶冶中，常在感情有所触发时，自会发为歌咏，经过长期锻炼，诗词创作在艺术上有一定工力，情意所之，辞无不达。这点过去长期被视为无足轻重的技能，在社会上普遍滋生对古典诗词创作兴趣的今天，也显出了它的意义和作用。

我在作品上这样下工夫，今天在青年同志中一般不容易做到，因为他们的任务多、爱好广，时间确较紧张。但也可闹中处静，在自己生活中划定一个小圈圈，有计划、有恒心地每天用一定时间读一种书，连注解也不放过一字（必须读古注），这就须有潜心静志，笃情学问的精神。现在一般青年同志普遍表现的一个弱点，就是在作品上不多下工夫，每当进行一个课题的研究时，总是把大量精力放在搜集材料上，较少注意作品本身的深入钻研，写出文章，看来材料丰富，局面开阔，却华而不实，缺乏创见，往往落到作品实际，便不免谬误。材料的搜集当然不可少，它有助于启发思路，充实论点，但作品与材料的主次应摆正，如自己对作品缺乏切实的理解，思想便会被材料所左右，不可能有独自の见解。

我们研究古典文学还应注意一事，即须学用一致，即把作品的学习和品德的修养结合起来。荀子说：“古之学者为己”，“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这一学习目的，我们是不应忘弃的。优秀的古典文学作品都体现着作者美好的理想，叙事寓含了对人事的是非善恶之理，抒情寄托着高尚优美的情操。尤其是优秀的诗歌，由于其艺术感染力强，可以对读者的感情起着深远的陶冶作用。读屈原、李白、杜甫、苏轼等人的诗歌，他们在作品中体现的关心国家人民、坚持正义、不屈服于邪恶势力的高尚品德情操，对我们可以起到教育激励作用，在人生中遭遇艰难险阻时便是有力的精神支柱。就是许多个人日常生活情绪的抒发，其中透露的幽美的情趣和意境，对读者在精神上也有涤烦除滥的宁静作用，有助于陶养人的美好品质。如对陶渊明，人们往往从消极方面去看待他的作品，那样绝不能真正理解陶渊明。昭明太子最能赏识陶渊明，他在《陶渊明集序》的末端说：“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此亦有助于风教也。”以“有助于风教”来推崇陶渊明文章的社会作用，确真正道出了陶渊明文章的精神意义所在。渊明痛恶社会现实的黑暗，决然归隐，躬亲农事劳役，备历生活艰苦而不易志，旷怀自得。曾当他疾困时，江州刺史檀道济“馈以粱肉，麾而去之”。这些高尚的个人精神品德，不很值得我们学习吗？我们学习古典文学，在获得必需的知识的时

也应吸取作品中的精神意义，作为培育精神品德的营养。我们如能以这种态度学习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也可有助于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使我国优秀的文学遗产，发挥出巨大的社会作用，也是我们整理研究文学遗产的一项重要任务。我经常以此诱导青年同志和学生，希望他们从事古典文学研究不仅为了获得知识，还要将其应用到道德品质的修养中去，不仅要成为有学问的人，还要成为有道德的人。

上述这些个人一曲之见，也许在今天被看作不合时宜，而我自己总算是这样走了过来，坦率地说出，聊供读者参考。

· 文史信息 ·

两晋妇女风貌

1987年湘潭大学《语言文学论集》(三)发表了王子兰《从〈世说新语〉看两晋妇女之风貌》一文。作者就《世说新语》一书，对两晋妇女风貌及其成因，作了探讨。

作者认为，魏晋时代，玄风炽盛，礼教衰微，玄学冲破儒家禁锢，越名教而任自然，成为思想界的主流。人们的言谈举止，表现出一种任真自然，潇洒脱俗的“通脱性”。这种时代精神给予了每一位生活在该时代的人以特有的印记。《世说新语》不乏这方面的记载。作者举《世说》“贤媛”一门所载“谢遏姊(道韞)……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气”条为例，指出，两晋妇女在精神上追求的是一种潇洒飘逸的境界，而这种“神情散朗，有林下风气”的精神境界正是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晋风度，也是时代精神所在。“贤媛”门还多处记载了两晋妇女的才智卓识，如谢道韞与名士刘柳谈议，“词理无滞”，“使之心神俱服”等等。

从《世说新语》中也可窥见“礼岂为我辈设也”的社会新思潮在思想上对两晋妇女的影响。“贤媛”所载谢道韞“大薄”丈夫王凝之的浅薄无能，王戎妻敢于蔑视丈夫“于礼为不敬”的警告；她们还游山玩水、吹拉弹唱、饮酒谈玄，希冀林下、追踪高范等等，这些都是当时社会新思潮在两晋妇女身上的体现。

两晋妇女对待婚姻的态度也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影响。“讲求脱俗的风度成了一代美的理想，名士风流”主要以其内在的思辨态度和精神状态，受到尊敬和顶礼。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性分、能力便成了重点所在。

作者总结说：从《世说新语》“贤媛”一门所载两晋妇女言事来看，两晋妇女风貌一是思想开放，朝气蓬勃；二是重才智而略妇德。两晋妇女的多以才智著称于世，屡遭前人非议，但作者认为，两晋妇女的风貌，是时代所造就；这种风貌也正好说明了两晋妇女的进步。两晋妇女形象比起宋元以下那种恪守三从四德，三寸金莲不出门户的受气包形象来，要可爱可敬得多。

老树春深更著花

清词述略(上)

严迪昌

· 文学史百题 ·

一、清词之特色

继元明两代词风日趋萎靡之后，清词振颓起衰，艳称“中兴”。“老树春深更著花”，一代清词以其流派纷呈、风格竞出的空前盛况，为词的发展史谱就了璀灿而丰硕的殿末之卷。

历经战乱和水火虫蚀之灾，清人词集亡佚不少，但即使如此，今存清词数量之浩繁，仍是超轶前代多多。《全清词》编纂中，仅顺治、康熙两朝就得词五万余首，词人数逾二千一百。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一代清词可搜集二十万首以上，词人也将达一万之数。如此蔚为大观，确实令人兴奋。何况，数量本身往往正是某种事物是否昌盛繁荣的标志的。

说清词是璀灿而丰硕，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它广阔而丰富地表现了清代270余年间社会现实的种种播迁，特别是透现出这人间百态在

各个层次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心头所引起的哀乐与悸动。这原是一个世道多变的时代。举凡明清易代之初山崩海立般的震憾，“科场案”、“奏销案”等诡谲多变的政坛风云激荡起的旧巢已覆、新枝难栖的悲慨与惶惑；“三藩”乱定后号称康、乾“盛世”或“十全王朝”时期才人志士们的抑郁寂寥；嘉、道以还外侮频仍、遍地烽火、“宗庙”倾圮的惊悚、凄怨、徬徨、怅惘……无不在词人们笔下有着深沉的抒述。词，已经用其实质的、充分发达的抒情功能表证着这一文体早就不再是“倚声”之小道，不只是浅斟低唱、雕红刻翠徒属清娱的“艳科”了。可以说，词在清代，已在整体意义上发展成与诗完全并立的抒情体，任何“诗庄词媚”之类别体之说已被实践所泯灭，词的可庄可媚，亦庄亦媚恰好表现出了其卓特、多样的抒情功能，这是清词的最主要的特色。这也是词的“中兴”说的一个重要方面的认辨和论定。

流派纷呈、风格竞出是清词的另一主要特色。流派的繁荣纷争无

疑是文学事业兴隆旺盛的标记之一。因为只有某一文体本身发展到非常成熟阶段，已具备大量的艺术积累可供作家们根据各自主观条件予以选择、承继、创变、更新的时候，方可能有众多流派的涌现。可以这样说，在词史以至整个古代文学史上，还罕有如清词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来如此成熟、如此鲜明又如此具有自觉性的众多的流派实体和群体性的词学活动。这种群体风格与词人们各自艺术个性的并驱驰骋、相互辉映，进而在切磋、融汇、新变这样流动的充满活力生气的过程中，焕发出光怪陆离的繁富景观，从而构成为“中兴”气象自也不足为怪的了。特别需要一提的是，清词流派具有较强烈的地域乡邑性或家族血缘关系，这些历史文化和文化地理的特性。这让人们愈益清楚地看到社会发展造成的大文化背景与文学事业的密切契合的内在联系。从而也足以揭示出狭义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非科学的偏颇。

二、清词流变之大观

清代词派的流变走向是与一代清词起伏盛衰的演化历程相同步的，下面略作绍述以见其概貌。

有“廓清之功”的“云间词派” 明代词的式微，其原因诸多，此处无法尽述。但淫哇风盛，格多邪冶；词曲混杂，调常舛误则是很严重的弊病。明末陈子龙、李雯、宋征璧、宋征舆兄弟等为挽颓风、继“词统”，树帜词坛号“云间派”。“云间”，今上海市松江县属，该派主要骨干大抵为松江、青浦以及上海县等籍贯。“云间派”标举“妍婉”之旨，追求“丽而逸”情韵，推尊南唐后主、北宋周邦彦、李清照。他们的作品主要存见《幽兰草》和《倡和诗余》，如陈子龙在这两部总集中各占有一卷。以雅正洗涤明词陋习，“云间”有廓清之功。但题多春花秋雨，不出风露月霜，仍视词为“文史之暇，流连声酒”的闲情排遣之“小道”，是一大局限。何况，云间词人以及后学者其实“心摹手追，半在‘花间’”。宗尚李煜、李清照词而无视二李特定的时势和延际，很难不取貌失神。再说，如同云间领袖们主张“文宗两汉、诗偁开元”一样，他们的追继“词统”说仍还是一条回归于“古”的道路。显然，这与明末四海动乱、社稷行将崩析的现实和词人们实际心态也每难和协。

陈子龙殉难于清顺治四年(1647)，他“甲申”前后的某些篇章如《唐多令》(碧草带芳林)、《二郎神·清明感旧》等有着明显的风格变化，可惜留予他的时间太少，未及拓开一代新风。

然而清初顺治一朝，词坛大抵仍盛炽“云间”词风。一来是文学风气的新变并非就是与社会政局的更替同步在朝夕间；二来是作为几社领袖而又壮烈殉于故明的陈子龙，门生弟子遍及江浙，品节复为人尊崇；三是“香草美人”向有“寄托”之格，“词统”、“正宗”之说久为词人所恪守。清初“云间派”词人及作品除了张溥懿《词坛妙品》(又名《清平词选》)所录收的可资考查外，它的余风流响主要在浙江杭州和江苏扬州所构成的两个活动中心。

在杭州的代表作家是“西泠十子”：陆圻、柴绍炳、张丹、孙治、陈廷会、毛先舒、丁澎、吴百朋、沈谦、虞黄昊。他们是诗人也是词人，其中大部分以遗逸终老。陈子龙任官浙东时，“十子”均问诗学于卧子门。“国初，西泠派即云间派也”(《白榆集小传》)，这个论断是不错的。

扬州词坛是王士禛顺治十七年(1660)出任该府推官后形成的。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说：“昔陈大樽以温李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王氏《衍波词》不仅遍和《漱玉词》，还作了不少次“湘真”韵即拟陈子龙的词。他在扬州前后五年，词坛热闹非凡。这里聚集着著名的常州词人邹祗谟(著有《丽农词》)、董以宁(著有《蓉渡词》)，还有海盐的彭孙遹(著有《延露词》)。邹祗谟与渔洋合编了《倚声初集》，这是清初第一部大型词选，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明清词风相交接转化期的集大成的汇编。

值得注意的是广陵词坛在社集酬唱、合操选政的活动中，各种词派、各种风格开始相互吸取、相互交融。这是清词初期的一次新的骚动，在摩荡、扬弃、融汇中发生着嬗变。这种嬗变正是当时微妙复杂的心态、扑朔迷离的政局在词创作中的折射。聚集扬州的词家除了上述诸人外，尚有本籍的名流吴绮(菡次)、汪懋麟(蛟门)，有江都宗元鼎(定九)、南通陈世祥(散木)；还有嘉善曹尔堪(顾庵)、莱阳宋琬(荔裳)以及渔洋长兄王士禄(西樵)。此外则更有避居如皋八年之久的陈维嵩等。这里应该一提的是安徽黄山人孙默，他与王士禛等交往亲

密，几年中分批刊刻了“留松阁”本《国朝名家诗余》，从而保存了清初十七家词人的前期著作。这一举动本身意味着清词已在新的嬗变中酝酿自己的兴盛期。

这是风会转移、流派消长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从此“云间”余风日见消衰，诸家风格各自在寻找自己的历史位置。一种强烈地以一吐时代感受为快事的抒情词派已在胎动着。

顺治、康熙朝的“稼轩风” 本来这不是个适宜软语温馨地歌板低唱的时期。对相当一部分遗老故旧来说，痛定思痛、余哀未尽；而新王朝为稳固其统治，还来不及王霸齐施，更多地动用高压镇压手段，惊恐与悲慨袭击着广大的汉族士子。清政权除了在上层或扶植、或剪除汉族出身的官僚文人，在更广阔的面上特别是对东南一隅接连以“反诗案”、“科场案”以及“奏销案”来震慑威劫、杀戮贬斥大批知识分子。尤以顺治十四年“科场案”手段最见严酷，顺治十八年“奏销案”打击最是宽滥。这样，“花间”、“草堂”型的婉委绮丽之调实不足以泄心绪的激荡，情感的强烈度难以与“艳科”之调协调起来。于是，继一批遗民词人如王夫之、屈翁山以及释澹归（金堡）等的猿啼鹃泣般的词作之后，南宋辛弃疾所开辟的“稼轩风”的悲慨激越之调重又振起了。尽管呈现的外部形态不能不饰以当时特定时代的色彩，时而直露，时而隐曲，但那种凄惶慨然的心态是按之即得的。就我所知，如河南刘榛的《董园词》，入选于傅燮调《词觐》的傅世珪的词以及稍后些时的淮阴金人望的《瓜庐词》等，不仅在词中大声赞颂“稼轩风”，斥弃“脂粉气”，而且或以凄清冷峻、郁勃狂放的风格，或以冷嘲调侃、放胆无惮的笔调，表现狼烟白骨遍地的惨象、抒发才士备受凌辱的愤怒。这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作家，但他们各自从特定的角度呼唤着一种时代的需要。

发生在康熙十年的北京的“秋水轩唱和”也是“稼轩风”在清初的一次集团性的鼓动。虽然这次唱和活动并无明言的主张和宗旨，但一股难以名状的郁结的悲凉，在此起彼和的《金缕曲》联章同韵的酬唱中得到了一次尽情抒发。这次诚如后来顾贞观在词序中所说的“一韵累百”、天下遍和的群体活动是曹尔堪首倡，周在浚（亮工长子）组织，在“辇毂诸公”如龚定孳的支持下兴起的。最先参与此活动，在“仙佛英雄同

一体”(周在浚词语)的唱和雅集中十分活跃的除去“缙绅”僚属外,有著名遗民纪映钟,有淮南名士杜首昌,有陈其年三弟、名词人陈维岳。龚鼎孳作为清初“江左三大家”之一,原是个复杂人物。他擅词,成就较诗为高,有《香严词》、《三十六芙蓉斋词》。“秋水轩唱和”是他生命最后二年的作品,今存“剪”字韵《贺新郎》二十三首,或萧瑟、或郁勃、或清旷、或深沉,是把握其暮年久历浮沉后心态的重要文字。还应该提到曹尔堪。他著有《南溪词》,顺治九年(1652)进士,仕途多艰,中遭牵累一度下狱,后退归终老。他不仅是清初三次大规模唱和活动——在杭州的《满江红》调“江村唱和”、扬州的《百字令》调“红桥唱和”和这次“秋水轩唱和”的倡导者,而且是浙江嘉善地区“柳洲词派”的主将。论者一向拿他与曹溶并列为“浙西词派”的开先河者,是一种误解。关于“柳洲词派”,邹祗谟《远志斋词衷》曾论及:“词至柳洲诸子,几二百家,可谓极盛。”又说:“要之阮亭所云:不纤不诡,一往熨贴,则柳洲词派尽矣”。这一词派源出“云间”,而“国变”后率先变易风格,渊淳豪迈兼有。代表人物除曹尔堪兄弟子侄数十人外,主要还有魏氏、钱氏、戈氏众家族,魏学渠《青城词》三卷今尚传世。《柳洲词选》六卷则是清初大型地方词选之一种。这个词派历来未被论者注意,其实倒是研索明清词风递变的一个重要典型群体。所以,轻忽曹尔堪是很遗憾的。

“悲慨激扬”的“阳羨词派” 就在上述“稼轩风”顺乎时势地重振之际,以陈维嵩为主宗的阳羨词派崛起了。陈维嵩的《湖海楼词》虽时有论家涉及,但清初这个重要词派却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这是一个以悲慨激扬和凄丽萧瑟的多侧面的情思,浓重表现出那个特定年代凄苦心态的词学流派;也是典型地体现身处新旧王朝交替、进退出处艰维的一代文士精神面貌的艺术派别。这也是一个敢抓大题目写大主题,视词的创作功能等同于“存经存史”,亦经亦史(见陈维嵩《今词选序》),从而真正推尊了词体的词学派别。仅据《荆溪词初集》、《瑶华集》所载,当时宜兴一地词人多至一百余。陈氏昆弟陈维崧、陈维岳、陈维岱、陈宗石,子侄陈履端、陈枋皆卓然成家外,史唯园、任绳隗、徐嗜凤、曹亮武、万树、蒋景祁等无不名著于当世。至于万树的《词律》之纂,有功于一代清词,是无容赘述的。

清代的家庭结构及其人际关系

· 历史百题 ·

冯尔康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初级社会群体，却又是社会的“微型整体”，可以反映社会的若干重要状况，清代家庭生活史将向人们揭示清代社会的重要特点。

家庭以婚姻为基础，夫妻关系至为重要；血缘关系是家庭的纽带，父子关系在家内诸种人际关系中有特殊地位；家庭因其成员的血缘结构和婚姻状况，区分出不同类型和规模。我们将把家庭结构和家内人际关系作为清代家庭史的主要内容予以说明。

一、多种类型的家庭结构

现代人把父母和他们的未成年子女组成的家庭称做“核心家庭”，我们在清代的档案和家谱、方志、文集的传记中看到不少这类家庭的材料。康熙中江苏昆山人陈涵玉，有妻赵氏，子秉衡，三个女儿。计六口人。（《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五辑59页）乾隆时湖南桃源人李盛瑞，有妻和子，三口人，有弟李庭鹤已分居另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档，内阁全宗·刑科题本·土地债务类，嘉庆三年69包）这些人，成员包括父母和未婚的子女，子女有成年的及未成年的，以父母为主体。家庭人口不多，在三到六口之间。这些家庭大多从事农业，但经济状况不一，贫富相差悬殊。

康熙间江苏长洲人黄某，有妻，有儿子夫妇，有孙男、女各一人，六口。（彭绍升《二林居集》卷23《黄氏家传》）吴县王某夫妇，有子王福生夫妇，另有女孙一人。（民国《吴县志》卷70《孝友》）这类家庭有两代人夫妇，不同于前一类型的只有一对夫妻，第二、三代是第一代人的子孙，是他们的直系亲属，这种家庭叫“直系家庭”。两对夫妇以外的人口，古人叫做“余夫”，是家庭次要成员。它除了上述诸例中的第

二代人的子女，还可以有第一代人的未婚子女。家庭人口在四至十人之间。

清初浙江乌程(今吴兴)人庄胤城，家富有，生三子，长廷钺，次廷铄，即以明史案而出名的人，廷铄无子，其兄弟皆有子，庄胤城有三房媳妇及若干孙辈，后主持分了家产。(《顾亭林诗文集·书吴潘二子事》)嘉道时武进人张悦、张怡弟兄，都是生员，有老母，兄有四子，弟得一子，长期共同生活，后议分家，张怡为让产，提议按小五房分，而不以老二房为准，是时第三代也应有几对夫妇了。(《毗陵天井里张氏圣经公支谱》卷9)这类家庭在其分裂以前，第二代有两对以上夫妇，以此不同于直系家庭，而且有的有第三代夫妇，甚至不只一对，它可以视为核心家庭、直系家庭的联合体，故叫做“联合家庭”。

雍乾时山东栖霞北埠郝姓一家，五十余口，有田一百多亩，同耕共食。学者郝懿行就与这个家族同宗。(郝培元《梅叟闲评》卷1)乾隆中湖南沅州蒲宗瑾家六世同居，其第三代兄弟五人，四代十七人，五代四十一人，六代六十人，共一百二十三人，由家长主持家政，各房没有私财，大锅里吃饭。(《清稗类钞》五册2508页)这种家庭成员多，辈分多，全有血亲关系，可称为家族家庭。

清代存在着没有一对完整夫妇的残缺家庭，还有独身家庭，这些是所谓鳏寡孤独畸零户。

各种类型的家庭互相联系，其成员经常不断地互相转化，前述联合家庭之庄、张等户，分家后产生出若干直系家庭和核心家庭，而原先的联合家庭不复存在。反之，核心家庭人口增多，可以发展为直系家庭或联合家庭；人口死亡还会成为残缺家庭。因此我们说清人家庭类型是固定的，内部成员则是在不停地变化中。当然，这些情况在其他朝代也都可以看到。

清代家庭有那么多类型，各类占据什么样的地位呢？即以何种为主，何种为次，人们大体生活在哪种家庭呢？回答这个问题的方法，最好是以户口册为资料，逐户逐个类型作出统计，算出比例，就很准确了；如果有不同时期的资料，还可以说明各种家庭类型在清代各个时期的变化。然而由于资料的不完整和难于搜集，现时不能采用这个

方法，只好退而求其次，研究户口平均数，以了解各类家庭大致的地位。

乾隆《大清会典》记录，乾隆十八年（1753）各行省总计户数3884万，《清高宗实录》记载，这一年人口18367万，平均每户4.7人。道光九年（1829）福建户数3999143，口数19081872，正巧也是平均每户4.7人。另据方志所提供的江苏吴县、江阴，安徽芜湖、太湖，浙江新昌、诸暨，江西于都、萍乡，福建云霄等县不同时期户口数字，我们计算结果，有的县平均每户高达18.9人，少的才1.4人，总算起来平均每户7.4口。（限于本文篇幅，不能详列具体数字和演算过程。）上述各种平均数是就我们所掌握的资料得来的，可以说是随机抽检的结果，不是普查，也不是典型调查所得，很难说它具有代表性。我们只能从全国的、一省的、若干县的平均户口数产生一个印象，即清代每户平均约有五口人。

前述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的实例中已知它们的人口一般在五口上下，前者以五为上限，后者以五为下限。从全国平均五口来看，这两类家庭应占家庭的大多数，而把联合家庭、家族家庭、残缺家庭排斥于次要地位。因此可以说，清人大多生活在直系家庭和核心家庭中，家庭规模不大，成员不是很多。

二、以丈夫为主宰的夫妻关系

传统的夫尊妻卑的名分观在清代没有变化，只是个实践问题，法律对男女的不同科罪也是实行中的事情。清代以丈夫为主宰的夫妻家庭生活大致是如下情形。

在夫权之下，有的丈夫通情达理，而妻子在传统的三从四德伦理薰染下甘愿处于屈从地位，夫妻相处很好的不乏其人。《广东新语》作者屈大均，在宁夏与王华姜结亲，偕游山西、江南，年老后回到故乡广东番禺，王氏先卒，大均将友人哀悼词章汇为《悼丽》一书。其伉俪情好，传为美谈。乾隆丁未科鼎甲孙渊如妻王采薇能诗词音乐，谱曲吹奏给丈夫欣赏，渊如每每动情，妻死后绘其奏乐图像，永兹纪念。孙的妹妹嫁给吴鼎，帮助丈夫学习，希望他能与哥哥一样中鼎甲，郎舅